

歷史與意識形態之間

● 李天綱



弗蘭克的《白銀資本》對歷史學本身的貢獻是其次的，其意義在於西方意識形態的重建。作者成功地綜合出一段容易受到誤解的歷史，力圖以此推翻「西方中心」，建立「全球主義」。但是，《白銀資本》陷入了非歷史的推論。全書的矛盾，在於歷史和意識形態的脫節。

弗蘭克著，劉北城譯：《白銀資本》（北京：中央編譯出版社，2000）。

粗粗讀過弗蘭克 (Andre G. Frank) 的《白銀資本》 (*ReOrient: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*)，我覺得它對歷史學本身的貢獻是其次的，其意義在於西方意識形態的重建。本書的寫作方式，是以他心目中的舊意識形態代表 (馬克思、韋伯 [Max Weber]、布羅代爾 [Fernand Braudel]) 為矢的，作負面評價；同時，把歐美日漢學家和其他東方學

家的近年成果作正面總結。作者成功地綜合出一段容易受到誤解的歷史，力圖以此推翻「西方中心」，建立「全球主義」。這都是一個良知良能的西方知識份子的可敬可佩之處。但是，如何正確地運用這段歷史，建立新的意識形態，《白銀資本》陷入了非歷史的推論。全書的矛盾，在於歷史和意識形態的脫節。

「入超白銀」確實是十九世紀以前「天朝大國」的本錢，這也是歷史學界談了幾十年的老話題。十幾年前，朱維錚運用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全漢昇的白銀問題研究，就曾提出：「十八世紀的中國較諸同時代的歐洲，無論經濟繁榮還是社會穩定，仍然處於領先地步。」弗蘭克之前，中國學者全漢昇、梁方仲、彭信威等人根據中西文獻，對白銀輸入問題作了大量研究。近年來，哈佛大學孔飛力 (Philip A. Kuhn) 的《叫魂》 (*Soulstealers*)、斯坦福大學卜正民 (Timothy Brook) 的《愉悅的混亂》 (*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*)，也都用白銀研究，證明明末經濟的繁榮。李陀、劉禾建議把原書名改成《白銀資本》，是很有見地的。

為說明從明正德到清乾隆間白銀輸入觸目驚心之程度，這裏還可以補充《白銀資本》裏沒有提到的兩

個例子：十八世紀，歐洲缺少白銀，銀餐具一度被中國瓷器代替，付錢買東方瓷器，如此便循環流失更多的白銀；同時，顧炎武在繭季的江南，看到海外商人「五月載銀而至，委積如瓦礫」。《白銀資本》引述卜正民的研究，認為「在明代，中國，而不是歐洲，是當時世界的中心」（頁168），確實是有根據的。因此，弗蘭克詳細論證明代已有「全球貿易」，中國是世界財富中心等，至少可以推翻說中國「黃色文明」，自古閉關的陳詞濫調，這是讀者（包括本人）喜歡本書的原因之一。

但是，在歷史有所缺席的地方，弗蘭克推論之大膽，表現出一個意識形態愛好者和明清史專家的差別。《白銀資本》的目的，不僅僅限於恢復歷史，它更想以此推翻西方人幾百年的成見。弗蘭克綜合了不少歐美學者「邊緣文化」研究的成果，在白銀和人口問題上絲絲相扣，步步推進，是很嚴謹的。可他忽視了更多相關的歷史事實。他太急了。因為找到了這把「白銀鑰匙」，也為了盡早推翻舊有的「歐洲中心論」、「歐洲特殊論」，他把歐洲的興起，單一地歸結為十九世紀向東方掠奪白銀等財富的結果。

我仍然傳統地以為，歷史的興替是由許多非貨幣、非經濟原因左右的。我們固然看見了白銀曾經自西徂東地流向中國，但更要看到更多的事實：一，明清時期的全球市場並不為中國商人掌握。「倭寇」和隨之而來的「禁海」，使原本在日本、南洋貿易中活躍的江、浙、閩、粵商人退居次席。不僅全球大「三角貿易」，就是中國江南、日本關東和東南亞的小「三角貿易」也是

在葡萄牙、荷蘭商人手中。揚州、明州、泉州的衰落，澳門的崛起，說明了問題。二，當時中國、印度、日本在白銀總量上可能比歐洲多些，但考慮到中國當時急劇的人口增長（何炳棣以為從1700年的1.5億，增長到1794年的3.13億），大量進口的白銀成為通貨，攤到每個人頭上，中國的財富不是增加而是減少了。當然，江南的富裕另當別論。三，回看西方，靜悄悄的「文藝復興」大有成效，轟隆隆的「工業革命」正在發動，東印度公司家家興旺，民族認同迅速完成，這些被忽視的「文化因素」、「制度優勢」，都是比一時的白銀多寡更重要的事實。

事實上，歐洲的潛在優勢已經很明顯，例如：1612年，利瑪竇等人翻譯的精確天文曆法一舉佔領欽天監；1627年，擊斃後金努爾哈赤的「紅夷大炮」是從澳門引進的；1693年，救了康熙命的「金雞納霜」，是耶穌會士在秘魯發現的。舉這些老生常談的例子，一方面是因為《白銀資本》沒有處理類似的問題，另一方面，也正好可以看出當時亞洲和中國的財富固然還有不少囤積，但內囊已空，底氣不足，社會問題更多。

歐洲的強勢，不在於其財富多少（事實上應該考慮：歐洲人把貨幣轉為資本，不事消費，大量投資航海、貿易、農業和工業，因而有「白銀危機」），而在於其潛力巨大。如果我們真的用一個「長時段」的眼光來看歷史的話，自然會發現西方崛起的趨勢不是一兩百年的白銀流向能改變的。歐洲的興起，確實有我們稱之為「近代性」的東西在起作用。法制、人權、契約、信用、理

在歷史有所缺席的地方，弗蘭克推論之大膽，表現出一個意識形態愛好者和明清史專家的差別。弗蘭克綜合了不少歐美學者「邊緣文化」研究的成果，在白銀和人口問題上絲絲相扣，步步推進，是很嚴謹的。可他忽視了更多相關的歷史事實。

我完全同意在國外的中國學者打開中國文化的範疇，使之融合於全球化意識形態的討論之中。但到底怎樣建立一個可靠、可信又可讀的「全球化」意識形態，真正把中國人和西方人的歷史感協調起來，確實還有很長的路，需要中外學者一起來走。

性、科學、市民社會……，乃至於在當時一半是動亂因素的宗教信仰，都是社會動力，推動了歐洲車輪往前滾。這些因素的形成，不止是弗蘭克說的五百年，甚至要有一千年。這並非看輕中國，事實上，這裏絕不持中國不可救藥，需要全盤西化的觀點。在此問題上，本地的中國史學者確實應該多聽聽西方同行，如狄百瑞 (William Theodor de Bary)、杜維明、魏斐德 (Frederic E. Wakeman)、黃宗智、卜正民、包弼德等人的意見。他們認為基本的「近代性」，如「自由主義」、「理性精神」、「市民社會」等等因素，也以不同的方式存在於中國古代。可惜，這些本應是對弗蘭克有利的觀點，都在《白銀資本》的視野之外。

總之，嘉慶四年 (1800)，「康乾盛世」已過，庫府漏卮百出，白蓮教蜂起，「山中之民」嘯集，戴震斥之為「以意見殺人」，龔自珍名之為「萬馬齊喑」的「衰世」，清朝更加地自憐內斂，走投無路。在一個需要徹底改革的時代，一個千瘡百孔的國度，還把世界的中心，或曰「霸權」，定在中國，恐怕多數中國史專家，無論國內外，都不能同意。通常，歷史學家講明清帝國的經濟繁榮，人口增長，並不掩飾中西對比，天平已經傾斜到西方。在非洲、美洲、澳洲的全球貿易中，西方已經捷足先登。這方面，朱維錚有一篇短文〈戮心的盛世〉最能揭露。

當然，《白銀資本》的目的並不是歷史，而是意識形態。解構馬克思以來獨斷論「近代性」話語，是作者的初衷，這是非常有價值的；挑戰「歐洲中心論」，是作者的敏銳，

也是需要孤軍深入之勇氣的。這都表明西方學術界在全球化視野下的一個非常可喜的自省傾向。但是，用選擇過的、有所迴避的有限歷史，是很難破舊立新的。在歷史缺席的地方，作者的「全球化」意識形態不免就得靠概念和信念構架了。首尾脫節，方法矛盾，使得作品失去不少說服力。作者批評歷史學家「見木不見林」。確實，歷史學家只敢根據明末的商業繁榮，提出「早期近代性」(Early Modernity，見魏斐德等在美國人文科學院學刊1998年 *Daedalus* 上的論述)，發現一條中國人獨特的，但又與人類共同精神相通的近代化道路。而弗蘭克傾向於全盤地否定「近代性」的討論。

不要誤會這是固守中國語境，反對建立全球化的意識形態。事實上，我完全同意在國外的中國學者打開中國文化的範疇，使之融合於全球化意識形態的討論之中，自己也試圖從此入手研究明清文化史。雖無緣面見弗蘭克，但他的研究手段、概括能力、思維縝密都是我難以企及的，他的學術誠意也是我欽佩的。他的幾個朋友，如濱下武志、魏斐德、卜正民和劉禾的工作，都是我素所尊敬的，倒是曾有多次機會請教意見。但是，歷史和意識形態的有機融合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這方面，弗蘭克雖然比中國的新舊意識形態談論者們強得不能以道里計，但到底怎樣建立一個可靠 (reliable)、可信 (reasonable) 又可讀 (readable) 的「全球化」意識形態，真正把中國人和西方人的歷史感協調起來，確實還有很長的路，需要中外學者一起來走。